



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——陈嘉庚纪念章。铜质，直径4.5厘米，上海造币厂铸造。正面镌有陈嘉庚肖像，注明“1874—1961”生卒年代，背面上方刻有毛泽东题字“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”，下方绘有厦门集美学校远景。



陈嘉庚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纪念章，背面刻有“厦门大学——中国重点综合性大学”中英文字样。



鲁迅手书“厦门大学”校徽。



鲁迅在厦大纪念章。



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建院纪念章，铜质，直径7厘米，1980年。

徽章上记录的 厦门大学百年历史

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，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。2017年，厦门大学入选国家公布的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。建校百年来，学校秉承“自强不息、止于至善”校训，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，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、师资力量雄厚、居国内一流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。

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。百年来，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，形成了“爱国、革命、自强、科学”的优良校风，以及鲜明的办学特色，以服务国家、服务人民为己任，先后培养了40多万名优秀人才，为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

陈嘉庚（1874—1961），福建同安（今厦门）人，著名爱国华侨领袖。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经商，1904年开始自立门户经商办实业。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，1911年被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，曾募捐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。1913年至1920年在家乡集美村先后创办中、小学和师范，

范、航海、水产等学校，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等，1921年又创办了厦门大学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在新加坡领导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，当选为主席，发动南洋华侨积极捐款，支持祖国抗日战争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40年组织南洋华侨到重庆、延安慰劳抗战军

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

科两年、本科四年。林文庆接受陈嘉庚先生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。至1930年6月，初步建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，全校共设5学院、21学系。1924年6月，厦门大学三百多师

鲁迅与厦门大学

门大学”校名就是采用鲁迅先生的手书。

1937年7月1日，经陈嘉庚函请，政府同意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，更名为国立厦门大学。著名物理学家、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博士任厦门大学校长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新任校长萨本栋立即带领师生迁往鼓浪屿。为保证教学不致中

新中国成立后的厦门大学

家“211工程”建设行列。2004年被列入国家“985工程”二期重点建设高校之一。

1958年，厦门大学师生响应号召，到龙岩的钢铁基地马坑参加生产劳动，还参加当地水坝的修建，参加海防前线的对敌斗争。厦门大学为优秀师生颁发纪念章和纪念册。

厦门大学学术交流基地

19日，升格改制为台湾研究院。厦大人类博物馆是我国第一所附设于高校的人类学专科博物馆，2000

民。抗战胜利后，在新加坡创办《南侨日报》。1949年陈嘉庚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

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，献给救亡大业，献给振兴中华，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。

生因学潮离校迁上海，成立了“大厦大学筹备处”。“大厦”即“厦大”之颠倒，后来取“光复华夏”之意定名大夏大学。大夏大学是1951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。

断，经与福建省政府协商，教育部批准，厦门大学内迁往闽西长汀。厦大在长汀办学八年，虽然办学条件极为艰苦，但成就巨大。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，组织成立“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”等团体；另一方面勤勉学习，发奋攻读，务求求得真正学问，在校生活达到了1044人，学系从9个发展到15个。

1981年，厦门大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万象更新，隆重举办60年校庆活动。当时在校学生有77、78、79、80四级，其中77、78级是恢复高考后入学的。厦大1921年首届学生吴亮平（中央党校顾问）、著名数学家陈景润、刚获任命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等校友参加了校庆典礼。

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著名博物馆之列。

（据收藏快报）

收藏鉴赏

元青花高足杯瓷器 有哪些特点

高足杯也叫高足碗，或者靶杯，是流行于元代的酒器，是热情的蒙古草原民族用来招待最尊贵客人的酒器。高足杯釉色和器型随着时代演变在变化，小编带你来了解一下元青花高足杯瓷器特点。

元青花诗文高足杯口径6.8厘米，底径3.4厘米，高8.4厘米，口微外撇，弧腹，下接喇叭形高足。杯外壁以青料写有诗文“人生长在醉，三万六千场”，既为装饰，体现了元代人的豪迈，又点出高足杯就是喝酒的酒器。这就是古代文物给我们留下的证据。



↑元青花诗文高足杯

元青花高足杯瓷器特点

元青花高足杯采用进口钴料，有铁锈斑，收藏元青花瓷器的人都知道。元青花高足杯杯身与足部采用湿胎拼接工艺，圈足与杯底结合处无釉，涩胎一周，足中空，足端平切露胎。元青花高足杯胎体比较厚，碗的底部更纤瘦。

元青花月影梅纹高足碗胎质洁白细腻，器壁很薄。釉色白中泛青，光亮莹润。纹饰简洁明快，青花色泽清淡高雅，是元青花中少见的瓷器。

元青花月影梅纹高足碗口径11.8厘米，底径4.5厘米，高9.5厘米，侈口、斜直壁、竹节形高足。外壁光素无纹，内壁口沿饰两道弦纹，一侧用青花绘一枝盛开的梅花，另一侧绘一钩弯月，碗心点六个圆点。



↑元青花月影梅纹高足碗

元青花高足杯早期特点

元青花高足杯早期特点应该就是高足碗，因为蒙古人比较豪爽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杯如碗大，早期元青花高足杯上部的碗形开口比较大，容量更大，装的酒就多。早期元青花高足杯柄足比较矮，这样方便骑马的时候携带，在草原上使用的时候，放得比较稳，因为底盘比较低。

早期元青花高足杯有竹节型高柄足，一是美观，二是为了方便携带，蒙古人比较注重实用。

早期元青花高足杯分上下两部分，可以抖旋旋转，应该是吸取了金银器的功能。

转把高足杯应是元代早期高足杯的时代特征之一，杯与杯把皆可自由转动。



↑元青花松梅纹高足杯

元青花高足杯晚期特点

晚期元青花高足杯除了使用，小编觉得更侧重于礼仪用器了，因为晚期元青花高足杯的口变小了，从高足碗逐渐演变成高足杯了，多用于蒙古人在蒙古包款待尊贵的客人。

晚期元青花高足杯柄足变成细高了，器型也更漂亮了，从实用开始转变到观赏器了。

晚期元青花高足杯竹节装饰变少，以素纹饰，说明实用的装饰功能逐渐弱化。

元青花松梅纹高足杯通高10.2厘米，该高足杯采用抖旋成型。上部为碗形，口沿外撇，深腹稍外弧，杯心平坦，下承喇叭状、竹节型高柄足，杯外壁在向下两组弦纹之间，绘“岁寒三友”图一组，内壁口沿处绘青花网纹一圈，内底绘折枝菊一朵，外绘双弦纹。

（据样书收藏）

梁思成林徽因伉俪 圈阅批注《大唐西域记》原本现世

《大唐西域记》将于6月5日在中国书店春拍

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旧藏重要资料，一本1937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即将于2021年6月5日在中国书店春拍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引来关注：书中有梁思成、林徽因的亲笔批注。这是首次发现林徽因在相关文献上作圈点及批注。同时，在这册中国营造学社旧藏本的扉页、内页，分别钤盖有三枚庄严精美的“中国营造学社”朱红印章，目前也是首次发现。

此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2月，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学基本丛书第四版本。据史料分析，由于日寇入侵，北平沦陷，1937年7月，朱启钤、梁思成、刘敦桢三人联名，将其作为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，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中；1939年8月，天津大水灾，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多被毁，这册《大唐西域记》得以幸存。由此可推断，书内朱墨笔批注和圈阅（与唐代古建筑相关），应是形成于1937年2至7月存入之前。

书中有圈点或批注的上百处，乃至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的手迹。判断书中手迹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的笔迹基于以下几点：

首先，梁林长期寻找和研究中国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，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其必参考的文献资料。早在1930年前，梁林二人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，即已开始研究《大唐西域记》内的雕塑（见《中国雕塑史》，《梁思成全集》第一卷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，第105页）。只是当时，此版此册梁思成、林徽因用来查找唐代建筑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尚未印行。二人于1937年6月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，由此可推断，在此前后，二人一定曾大量查阅和唐代木质结构相关的和唐代佛教相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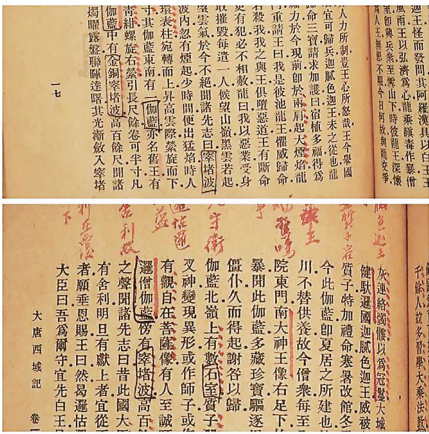
的书籍。这也可进一步解释，为何书内圈阅批注的内容多和唐代古建筑相关。

其次，从笔迹比对，可以证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该册书的圈阅和批注。

该书有被明确确认的梁思成手迹。经比对（参考《百年清华学人手迹选》）献给清华大学百年华诞，杜鹏飞主编，2010年朴庐书社出品，第67页梁思成毛笔真迹书影），梁思成用朱笔圈阅、批注本书至第22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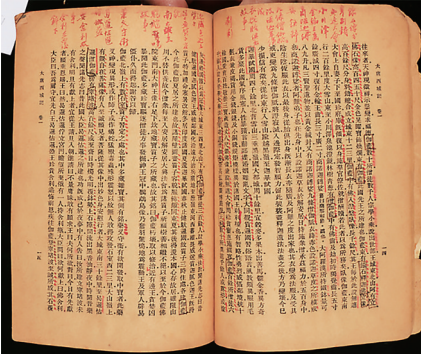
该册书第五页头头有一处笔形纤细的铅笔审慎圈阅，经比对（参考《叩开鲁班的大门——中国营造学社史略》，林林著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版1印，第121页刘敦桢手迹书影），应当出自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之手。梁思成和刘敦桢同为学社部门负责人，且研究领域相近，在那个书籍仍相对昂贵的年代，同行内部之间分享书籍乃是常事。

从第6页（六）到第185页（一八五），有大量的黑色钢笔圈阅手迹，圈阅内容为《大唐西域记》内几乎全部的唐代建筑文字表述，判断当为林徽因手



迹：一方面是因为从人物关系来看，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工作上不分彼此。另一方面，在该书第135页（一三五），有黑色钢笔批注“此下疑有脱落”，经笔迹比对，此批注出自刘敦桢，也非出自梁思成。而在经过笔迹比对后（参考《林徽因集：诗歌 散文》，林徽因著，梁从诫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1版1印，第82页）也可最终确定，“此下疑有脱落”是林徽因手书。由此进一步确定，几乎贯穿全书的黑色钢笔圈阅，必然是林徽因留下的。

梁思成在这册《大唐西域记》内朱笔批注的，有不少为当时地名，如第八页头，有朱笔字迹“大清池”，即指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，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大湖。又有朱笔字迹“素叶水城”，即指唐代仍长安而建的碎叶城，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。还有朱笔字迹“干泉”，干泉为古地名，又名屏犀。故地在今吉尔吉斯北部吉尔吉斯山脉北麓，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，当东西交通线冲突，又有林泉之胜，



林徽因与梁思成圈点、批注——中国营造学社藏本《大唐西域记》

公元七世纪前期为西突厥可汗避暑地。

第一三五页的“同为一门”后，有林徽因墨色笔迹批注“此下疑有脱落”。经查阅季羨林等校注的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（1985年2月中华书局第1版）第748页为“於是周垣峻峭，同为一门。既历代君王继世兴建，穷诸劓刖，诚壮观也。”句中并无文字脱落，林徽因很谨慎地用了一个“疑”字，“疑有脱落”，这或许与她多年的欧美生活习气多少有点关系。

当前，暂无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圈阅、批注过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与《清凉山志》原本的信息。因此，这册《大唐西域记》原本，是再现二人发现“中国第一国宝”——五台山佛光寺艰辛历程的唯一原本。这册应为梁林伉俪圈阅批注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原本，在历经1937年日寇侵华和1939年天津水灾，且从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流出并幸存至今，为“中国一代才女”（林徽因）和“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”（梁思成）研究生涯夫妻唱妇随的再续传奇。

（据新浪收藏）